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8

王鴻仁譯

一九一七年

（丹麥）卡爾・傑洛拉普（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麥）亨利克・龐陀皮丹（Henrik Pontoppidan）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可是仍然極爲熾烈。經過凡爾登那場慘烈的廝殺之後，敵對的雙方對於大規模的屠殺均已感到木然，於是戰事更形慘酷，戰線也就隨著拉長——現在，被戰火波及的地區已不再侷限於佛斯（Vaux）及杜奧蒙（Douaumont）四周的據點了。二月，德國全面展開潛艇戰爭，結果迫使美國參戰。俄國方面，沙皇的帝國崩潰了。彼得格勒「二月革命」的過程有如曇花一現：以沙皇之遜位揭開序幕，而以十月之共黨奪權收場（註）。不管從那個角度看過去，歐洲的上空

（註）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克林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等人推翻沙皇，建立「俄羅斯共和國」。是年十月，共黨份子奪得政權，於是這個誕生沒多久的民主政體遂遽爾夭折。

確實是一片愁雲慘霧。

在這樣的時刻中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似乎不很適宜。遴選得獎人的工作在以前確實是很光榮的，而現在却變成了一項沉重的負擔，一件毫不惹眼的工作。這個世界正在上演一齣最大規模的戲劇，斯德哥爾摩這齣小戲根本無人關心。因此，這幾年一直沒有舉行頒獎典禮。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也不容忽視。瑞典覺得自己必須堅守中立。可是，甚至連這種「姿態」也都不很保險。就是最樂觀的人也看得出來：瑞典的中立是十分脆弱的。瑞典在波羅的海的海岸線和德國相鄰，同時她和德國的關係素稱和睦。這兩件事實造成了瑞典與協約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協約國對瑞典的政策十分猜忌。這種猜忌竟使瑞典政府在三月間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危機。瑞典朝野已經隱隱發現：「保持中立」和「一味牽就好戰成性的德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一九一七年，瑞典的態度略略偏向德國，因此法國和英國那年都沒有提名諾貝爾候選人。德國只推薦一名他們自己的作家，一顆「文壇的次等星」——保羅•厄恩斯忒（Paul Ernst）。這種冷淡的態度使瑞典學院大感狼狽，於是瑞典學院開始苦思對策，以求「體面地」逃離這個窘境。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丹麥、挪威和瑞典這三個中立國的國王曾經在馬爾莫（Malmö）聚會。這三位君主的聚會象徵著這三個偏遠國度的一次新的團結。它並且顯示出，以前瀰漫在北歐地區的爭執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它甚至還平息了一九〇五年瑞、挪分治所激起的餘波。

一九一七年，這三位國王再度在克利斯契愛尼亞（譯註：即挪京奧斯陸之古名）聚首。這是一次相當著名的會議。三個國家都樂於攜手合作，同時也都同意在危急時互相援助。三個國家的人民比以前更深切地體會到自己是斯堪地那維亞人。由於這個原因，瑞典學院終於將一九一七年的文學獎頒給了兩位丹麥作家：傑洛拉普和龐陀皮丹。

傑洛拉普曾在德國攻讀哲學，因此他具有一種強烈的德國氣質。他從一八九二年起便一直住在德國的

德勒斯登。他的書在德國流傳極廣。龐陀皮丹和傑洛拉普都是紹繼布蘭德遺緒的年輕一代的作家。

現在問題發生了：獎金該不該同時頒發給兩個人呢？在一些院士眼中，這是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這是一項難以忍受的「折衷措施」。因爲亞勒弗烈•諾貝爾曾經在他的遺囑中表示：他的錢應該用來維持得獎人的生活，而不是「小費」。部份院士認爲應該將獎金悉數頒給傑洛拉普。當他們的建議被否決時，他們自然感到異常失望。另一些人指出，這種平分法很恰當，很合理，很合乎「文學公道」，後世必然會讚揚這個做法。可是事實上傑洛拉普和龐陀皮丹都沒有這麼長遠的重要性。我們只能說：這種「對分法」是一項必要的措施，因爲在那種微妙的情況下，唯有這樣做才能皆大歡喜。

就這樣，當瑞典學院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召開全體大會時，它決定同時頒獎給傑洛拉普和龐陀皮丹。

傑洛拉普獲獎的理由是：「由於他多樣而豐富的詩作，因爲它們蘊涵高超的理想。」

龐陀皮丹獲獎的理由更爲簡單明瞭：「由於他對當前丹麥生活的忠實描繪。」

一九一六年

（瑞典）佛納•馮•海登斯坦

（Verner von Heidenstam）

「對得獎人而言，諾貝爾獎確實是一件好東西。不過，它們還有一項附帶的功用：讓人們注意一些他們不認識，然而却值得記住的名字。」法國評論家保羅•吉尼斯提於一九〇八年在一份叫「小馬賽人」的

雜誌上寫道：「雖然我們確實是好奇得有些過火，不過最近的一些小困擾已經提醒我們：亞勒弗烈•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指定瑞典學院擔任知識界的『裁判官』，而這位裁判官所選的多半是些我們不挺熟悉的人物。這是諾貝爾獎的一項重要功能，因爲當一些我們連名字都沒有聽過的作家或科學家突然冒出來領獎時，我們難免要問：這個作家或那個科學家究竟是什麼人呢？」

易言之，諾貝爾獎已經變成一項全球通用的「文學教育的教學工具」了。這種論調早在一九〇九年便已形成：那年拉格洛夫由於獲得諾貝爾獎而成爲一個舉世聞名的人物。一九一六年，這種論調再度出現了。當頒獎的消息發佈時，人們的興趣再度高漲了起來。這年瑞典學院同時頒發兩屆的獎金。一九一五年的獎金歸羅曼•羅蘭。在那段悲慘的烽火歲月中，羅曼•羅蘭的名字實在是太響亮了；可是一九一六年的得獎人呢？馮•海登斯坦——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

十一月二十號，巴黎一家叫「時代」的報紙鑒於大家對海登斯坦過於陌生，於是便刊載了一篇專論：「然雖海登斯坦在瑞典國內有不少熱烈的崇拜者，可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國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藝界人士對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學院就像變魔術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間成爲一個舉世聞名的人物——瑞典學院這份贈禮對一個作家而言，要比鉅額的現鈔珍貴多了。」

海登斯坦有若干作品曾被譯成法文，不過在熙熙攘攘的巴黎「文市」中，它們早就被淡忘了。一九一一年，他的「聖白理繼朝聖記」曾出現過法譯本。那是一本歷史小說，描寫中古時代一位著名的瑞典聖徒的事蹟。如果我們再往前推溯十年，則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本海氏著作的法譯本：「國王的史詩」（一九〇一出版）。那個法譯本出現之後，不久便告絕版。這部「史詩」也是一本歷史小說，描寫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的忠臣們的遭遇——英譯本就叫「查理的臣民」（The Charles Men）。法譯本的譯者叫"Jacques de Coussange"，這是一個筆名，眞名爲芭波•德•齊希埃爾（Barbe de Quirielle）。齊希埃爾夫人是當時法國文壇的一位著名人物；她孜

孜不倦地向法國人介紹北歐文學，而這本海登斯坦的法譯本便是她一系列北歐文學譯述中最早出版的一部。當一九一六年的頒獎消息公佈之後，許多人請她置評。她先在「辯論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年之後又在「兩個世界評論」上寫了一篇精闢入微的文字。

一九一六年巴黎的「通訊報」同時刋出兩篇關於諾貝爾獎的文章，而兩篇的立論恰好相反。其中一篇是出自比埃德•齊希埃爾之手，題爲「羅曼•羅蘭——一個法國的國際主義者」。另一篇題目爲「海登斯坦——一個瑞典的民族主義者」，作者爲 Jacques de Coussange，亦卽齊希埃爾夫人。這兩篇「夫妻檔評論」確實是在打對台戲，因爲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衝突確實是那個時代的特產。在那個痛苦與流血的時代中，這種衝突乃是「良心戲劇」的素材，而且是一種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素材。羅曼•羅蘭是一個滿懷憂思的和平主義者，托爾斯泰的門徒，高擧着理想主義的纛旗——然而這面纛旗不久就要被反對者踐踏、沾汚，甚至拋入血渠中。海登斯坦則是一個勤王的死士，邁着莊嚴的脚步，擺出一副中立的臉孔，帶着一種毋需有的決死神情——因爲凡爾登亙礮的怒吼聲和「紙上亙礮」的怒吼聲迥然不同，而筆下的戰場也只不過是一種悲慘的幻象罷了。

不錯，海登斯坦確實是一個瑞典的民族主義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日，雄壯的分列式，十八世紀的古礮在紙上怒吼，查理十二世的王徽在紙上閃亮。雖然那個化名爲 Jacques de Cossange 的女作家曾仔細研究過他的思想歷程，可是當她要向她的同胞們介紹這位得獎人特別偉大之處時，她仍舊有一種無從落筆之感。他是不是一個北極圈裏的巴瑞斯（Maurice Barrès）（註一）——是否像他一樣，緬懷祖國歷史的光榮？他是不是一個瑞典的愛得蒙•羅斯當（註二）——是否像他一樣，充滿了迷濛而誘人的韻

（註一）巴瑞斯是一位著名的法國小說家。他和海登斯坦最大的不同是：巴氏熱愛祖國，海氏則爲一名親德派。

（註二）愛得蒙•羅斯當：著名的法國戲劇家，最重要的作品爲「西拉諾•德•別吉拉克」。

律？是否像他一樣，是一個無法精確而合理地加以衡量的人？還有，人們要如何解釋他那部「國王的史詩」呢？那本書的主角，查理十二世，鼓舞他的臣民爲國爭光，可是却爲他們招來噩運——他爲什麼要借用這段悲慘的史實來宏揚瑞典的民族主義呢？

齊希埃爾夫人曾於一九一五年前往瑞典遊歷。這段期間海登斯坦曾邀請她到他鄉下的家裏作客。海氏爲人溫文，相貌俊美。他的側面輪廓非常美，以「極能吸引異性」聞名，因此他十分樂於讓人爲他拍攝側面像。他的政治立場偏向德國，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了。後來他甚至在一次新聞採訪中非常不智地宣佈：他在德皇威廉二世的軍隊身上發現了 Carlists（查理王的死士們）的美德：忠貞。齊希埃爾夫人顯然不清楚這位瑞典詩人的政治態度，所以她才用一種典型的愛國眼光來撰寫那篇刋登在「通訊報」的文章。她的結論如下：

「我多麼希望海登斯坦來這裏看一看今天的法國。他一定會很驚訝地發現：法國人和他筆下的瑞典人在道德上是如此的相近。再沒有一個民族會像這樣，爲一個高貴的目標團結一致，爲祖國効命。再沒有一個國家會像這樣，每位國民都準備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同時也絕沒有任何人能够在別的地方看到這麼堅定的勇氣和這麼偉大的情操。我國以及我們盟國的士兵都具有海氏筆下的英雄所具有的許多特質。我們之間或許會有一些差異，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們和這位偉大而高貴的詩人十分相近，因爲對於愛國心這件東西，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對於一切足以激勵全民在國家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奮起殺敵的事物，我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那年瑞典學院的頒獎決定並未激起很大的風潮。交戰國的候選人幾乎全都是由中立國推薦的。譬如說，法朗士和比利時的佛哈倫都是由挪威人提名的。亨利•詹姆士的推薦書則是從芬蘭寄出的（詹姆士在學院開會表決前去世）。只有德國保薦一位自己的候選人：伊利莎白•佛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

德國耶拿大學的哲學家倭鏗發出一封短札給瑞典

學院。他在信中宣佈：他很同情學院的處境，因爲她如果把獎金頒給交戰國——不管是頒給那一方，必然都會引起誤解。然而，要是學院因爲這個原因而取銷這屆獎金的話，他將感到遺憾。他認爲：如果把獎金頒給一名瑞典作家，則德國人一定會覺得很高興。他列了幾個名字。其中之一便是在十年前保薦倭鏗本人問鼎諾貝爾獎的古騰堡大學的哲學家。海登斯坦的名字也出現在倭鏗的名單之上。海氏的候選條件相當有利。他以前便已經被推薦過好幾次，因此他擁有對學院的頒獎決定不無若干影響力的「老資格」。不過，對海氏獲獎幫助最大的還是他在瑞典國內的崇高地位。

表決會議於十一月九日那天舉行。從會議的性質看來，這純粹是一次「瑞典的家務會議」。這點可從學院發佈的讚辭中看出來——因爲它並沒有提及海登斯坦對世界文學的貢獻，只提及海氏在瑞典文學的地位。學院頒獎給他是爲了要「褒揚他在瑞典文學新紀元中所佔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稿費待領■

梅濟民
李　藍
夏　菁
鄭愁予
方　旗

諸位先生，請示通訊地址，以便滙寄稿費。